

# 民国时期

1917—1949

## 中苏关系

田保国 著

济南出版社

Minguoshiqizhongshisuquanxi



#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

(1917 - 1949)

田保国 著

济 南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1917~1949/田保国著. — 济南:济南出版社,1999. 12

ISBN 7-80629-501-1

I. 民…

Ⅱ. 田…

Ⅲ. 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1917~1949

N. D829. 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3667 号

**责任编辑** 朱孔宝

**封面设计** 李兆虬

**出 版 者** 济南出版社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编:250001)

**印 刷 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

**发 行 者** 济南出版社发行部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30 千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 周尚文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开创了“一球两制”的新局面。从此时起,到新中国成立的32年间,中苏两个紧邻的大国之间恩怨交加,风雨频仍。社会制度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对立,历史上的积怨,固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但根本的原因,看来还是基于国家利益的不同,造成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悬案。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明确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与苏联“保持一致”,于是,民国时期所有历史悬案成了禁区、雷区,谁都不愿涉足。事实上,1957年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因对中苏关系史上的悬案发表看法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更使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噤若寒蝉。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可是,一段时期内,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没有恢复正常化,加上年代久远,研究历史悬案需静得下心来,耐得住寂寞,寻找和把握大量的资料,研究工作才能开展。田保国同志的这本书,就是这样熬过七、八个寒冬酷暑,奔走于北京、上海、山东之间,

利用他谙熟俄语的有利条件,钻研了大量中外文史籍史料,用他的心血写成的。

书中除了对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作了纵向概述外,我觉得最有特色、最有价值的,是对外蒙古问题、中东铁路问题、新疆问题等三大历史悬案作了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澄清了许多过去因不敢涉足学术研究而被弄得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问题。其中以外蒙古独立问题最为突出,最为典型。

外蒙古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混战中,沙俄通过武力征服并签订不平等条约,乘机掠夺了我国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千方百计阴谋将外蒙古分离出中国版图。十月革命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曾宣布放弃沙俄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当时曾获得各界的一致赞誉。可是,曾几何时,苏俄政府改变了调子,要使外蒙古成为所谓“自由国家”,一则鼓动蒙古的革命者搞“自治”、“独立”,二则苏俄红军借剿灭白卫军之机进入外蒙古。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1924 年 11 月,外蒙古宣布成立独立的人民共和国。尽管最初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后来的蒋介石国民政府从未承认其“独立”,但中央政府已无法在该地区实行统治,外蒙古“独立”已成既成事实。二次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政府迫于美英等国的压力,终于接受了苏联坚持的将外蒙古分离出去的要求,正式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地位。作为历史悬案,其内容和进程,无疑比这里描述的线索要复杂得多,旷日持久的谈判,台前幕后的争斗和妥协,军事、政治、外交的较量交织在一起,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中国丧失了这块原先属于它的领土,再一次领略了“弱国无外交”的滋味。

苏联的所作所为,当然与它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有密切的联系。

20—30年代,苏联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时时感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国内建设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争论。严峻的国际形势,要求社会主义苏联加强重工业建设,尤其是国防建设,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几十年间,苏联一直谋求在东西方各建立一个缓冲地区,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苏联的附属国和缓冲国,正是这场棋局中的一只棋。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两国间有着漫长的边界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先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应当帮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挣脱殖民主义的枷锁,取得民族独立,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要求。可是苏联在对华关系上的表现是复杂的。一方面,苏联曾在20年代北伐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期间给予中国人民不少无私的援助,这些历史功绩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但另一方面,苏联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也给两国关系造成许多消极后果,突出表现在只顾其本国的安全和利益,严重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和尊严。外蒙古、中东铁路等悬案便是其中突出的事例。不仅如此,苏联还通过共产国际插手别国党内事务,要求别国共产党人及其革命力量去承担“保卫苏联”的职责,并以此作为衡量一个党是否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国际主义的“试金石”。这种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抵制。

在20—30年代严峻的国际形势下,苏联政府采取各种外交手段来维护本国的安全和利益,这是应该的。但无论如何,它都无权以牺牲别国领土主权为代价来换取其一国的安全和利益。国与国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各国的领土主权都应得到尊重。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都应该遵循主权平等的原则,任何国家和政府不得凭借实力损害

他国的主权和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尤应如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发展。

本书涉及的中苏两国间的历史悬案虽然早已过去,但今天我们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辨别其中的是非曲直,既填补了一项历史的空白,又考察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如何制订自己的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这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

保国同志是我指导的首届博士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之初,他就确定这一课题深入研究。三年期间,他在广泛搜集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精心编撰大纲,写出了这篇2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论文史论结合,有叙有议,史料丰富,论证深刻,得到了有关专家的广泛好评,并建议他将论文作进一步修改后争取正式出版,为学术园地增添一株新花。如今,这个愿望得以实现,这是值得庆贺的。

1999年6月29日

于华东师范大学

### □ 叶书宗

田保国先生经多年悉心研究,撰成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的专著,我作为首批读者之一,掩卷之后,欣喜万分。又蒙田先生青睐,嘱我一并代作序,这可使我惶恐之至。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的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在世界上号召废除秘密外交,宣布放弃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在中国的一切权益。列宁和苏维埃俄国的声音,在世界外交史上确实是振聋发聩的,给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国家以后,就有了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尽管形成整体性的国际社会是近代以来的事,但国与国之间的国际交往,恐怕有三四千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国际交往中,主流当然是友好往来,但是也遍布激烈争斗和刀光剑影。不管是国际社会形成以前或者以后,也不管是在多边关系或者是在双边关系中,外交斗争也和政治斗争一样,纵横捭阖,既有惊心动魄的“白刃格斗”,也有各耍聪明机智的机关布阵。当然,总的说来,自古以来就是弱国无外交,但是这并不影响一部外交史几乎是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人的智慧史,是人们分析客观矛盾、把握客

观矛盾,使矛盾着的客观事物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的历史。而所有这些,又几乎都离不开秘密外交。打个不太雅的比方:比方玩纸牌,如果把底牌都亮尽,这纸牌可怎么玩呢?当然,我绝不是把外交斗争比作玩纸牌;更不是说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所号召的废除秘密外交是一种宣传攻势。因此,外交档案(当然是在形成档案制度以后)自然成了国家在一定时段里的最为机密的档案之一;而外交档案又是外交史研究者所借重的第一手资料,是形成观点、作出判断的主要依据。这已足见研究外交史的重要而又艰难了。

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是名义上保持着独立主权,实际上是列强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华民国,东北易帜之前,还处于军阀割据、四方混战的局面。在军阀混战的背后,还反映着各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与争夺。30 年代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鲸吞整个中国,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同时,在东北制造一个伪“满洲国”,在东南地区扶植了汪精卫的伪“南京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退踞西南,参加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一员。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大计,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华苏维埃红色政权改为各边区政府。

1945 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反法西斯同盟,终究不能转换成平时期的合作,反法西斯同盟破裂,开始了以苏、美各霸一方的东西方冷战对峙。和国际的局势变化相应,在中华大地上,国共和谈破裂,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束,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和毛泽东领导的红色政权,展开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俄国从 1917 年二月革命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政局。临时政府是实在的、掌握国家政权机关的、在国际上代表俄国的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政权就没有什么对

外关系。中国从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有4年之久,中国的红色政权与外国的交往、交涉,就不是“两个政权并存”政局下的俄国工兵代表苏维埃政权所能比拟的了。

在20世纪上半期,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了;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是仍受“三座大山”压迫的被统治者。从支援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阶级使命来说,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外交准则的苏联,理应支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但是,中国的当权者不是中国人民,而是中国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所建立的政权,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何况在中国统治者的背后,还站着帝国主义支持者。苏联与中国发生、处理双边关系,是与代表中国的中国当权者之间进行的。

因此,虽然从1917年11月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只有32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真是一瞬间。中苏两国的外交往还,也只是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但是,这短短的历史一瞬间,中苏之间的这种双边关系,却是非常复杂,且又微妙,各种关系也是千头万绪。所以,苏维埃政权发布外交宣言是一回事,将宣言的原则付诸于中苏双边关系的实际操作和具体事务的处置,又是另一回事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原则和实际操作是脱离的;而是说,原则是超脱于具体国家、地域、对象、时间、条件之上的一种抽象概括,当把原则付诸实践时,就要还原于具体的条件了,此中的差异是自然的。何况苏联作为20世纪崛起的,曾经称雄一时的社会主义大国,也有一个从创建到巩固,再从强盛到走向世界的发展变化过程,苏联自身也是变化着的。更何况,大国追求是苏联从沙皇俄国时代一直延伸下来的强烈传统。

中苏两国是紧邻,两国之间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线。中苏两国同是世界级的大国。中苏两国的双边关系史,不仅是中苏两国

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世界外交史的热门课题之一。田保国先生,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秉愚公移山的精神,以“板凳十年冷”的毅力,将20世纪上半期的中苏关系,梳理、分析、综合、提炼,写成专史。全书脉络清楚,资料翔实,分析恰如其分,语言清新流畅。此书的公开面世,实是幸事。当然,某些问题的深一步阐述,尚有待于日后档案资料的充实,而这正是田先生作为治史者的学者风范。喜读之余,记此文字,以为序。

1999年6月15日

于上海师范大学新村寓所

中国和苏联都是世界大国,又是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陆上边界的邻国。同时,两国人民有着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两国国家关系可以一直上溯到 1689 年《尼布楚条约》时期甚至更早,因此,中俄关系是近代意义上最早形成的中外国家关系。从长达 300 多年的中俄(苏)关系看,双方政府非常重视与对方的国家关系,将其视为本国和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然而从历史上看,两国关系却远非始终和睦相处,特别是近代以来,沙皇俄国大肆扩张,加入帝国主义列强对弱小国家侵略的行列,而中国清政府腐败虚弱,一任大国强邻的宰割。民国以前的一部中俄关系史,实际上是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的历史。

俄国 1917 年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翻开了中苏关系史的崭新一页。由于 20 世纪上半期是世界形势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两国关系不能不在更加复杂、极为广阔的世界背景下展开。世界形势和两国各自利益的交互影响、互为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和制约着中苏关系的发展进程。两国的漫长边界,和平时可以架起两国友好的桥梁,交恶时期又成为双方冲突的焦点。两国不同的意识形态常成为国家关系恶化的催化剂,而两国共同的国家利益又可成为改善相互关系的契机。因此 1917—1949 年间 32 年的历史中,中苏关系断而复续、继而复绝。可以说,

这一时期在中国与各国的双边关系中,没有一种关系比中苏关系更显得变幻多端,色彩纷呈,尤其是外蒙古问题、中东铁路问题和新疆问题,始终是这几十年来两国关系中的难解之结。

我们在这里把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史确定为 1917—1949 年是否合理?须知,民国开创于 1911 年,苏联成立于 1922 年。我觉得,如果以 1911 年为起始点,就会把中苏关系和中国与沙皇俄国的关系放置在一起,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关系,在叙述时容易引起某些混乱;如果以 1922 年为起始点也不合适,因为苏联对华政策是苏俄对华政策的自然延续,不宜将其人为分开。因此,我们把这一时间段确定为 1917—1949 年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即始于苏俄成立而止于民国终结。

在将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的上下限定格后我们立即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一个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宗旨,在对华关系原则上与前俄政府划清了界限,声明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个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标,在意识形态上坚持反苏反共,在社会性质上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发展阶段。这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特点是,两国除了自身国家民族利益的追求之外,又增加了意识形态和阶级关系的对立,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从而演绎出更加曲折复杂、跌宕起伏的历史活剧,这是当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大国之间关系的最大区别。

顺便说一下,1949 年以后的中苏关系,因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形成了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两国政治经济结构相似,追求的最终目标相同,理应成为新型国家关系的巩固基础,然而在此后长达 40 多年的时间里,两国却远非和睦相处,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处于对立状态,其中本国民族利益的考虑是两国关

系出现矛盾、发生问题的最重要原因。可见,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并非是国家间建立长期睦邻友好关系的充分必要条件:社会制度相同,不见得和睦相处;社会制度不同,也不见得兵戈相向。

1989年5月,中苏关系经过了30年的扭曲后终于实现了正常化,两国从历史经验中达成共识:国家关系应当非意识形态化,应以和平共处各项原则为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本来这是一个总结历史经验、重新厘定新的中苏关系的大好时机,但随后发生的苏东剧变却使这一过程嘎然而止,中苏关系为中俄关系所代替。新型的中俄关系又回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不同的是,与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相比,两国的位置互相置换,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俄罗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这里我想起了一位哲人的话: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总是在不断地重复;历史的奇妙之处还在于,它永远不会重复。正是由于历史经验的积累,新型的中俄关系绝不会是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的简单回复,历史的镜子给予我们足够的清醒,使我们在考察民国时期中苏关系时,对当前中俄之间建立长期、稳定、友好的国家关系充满信心。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是整个中苏(俄)关系的历史长河中起承上启下作用的纽带。研究这段历史,对于深刻认识和理解以后中苏(俄)关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许多问题往往可以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它产生的根源,这应该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现实意义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客观总结和评价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历史,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是中苏(俄)两国人民共同关心、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是根据我的博士论文补充而成的,在写作这篇论文时,我得到了许多国内著名专家学者的帮助。首先是我的导师周尚文教

授(华东师范大学),他渊博的知识、对问题敏锐而深邃的思考使我敬佩不已。叶书宗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也是我敬重的老师、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他的学识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是我学习的榜样。对我的论文给予巨大帮助的还有:姜琦教授(华东师大国际问题研究所)、张月明教授(华东师大国际问题研究所)、俞新天教授(上海社科院)、王斯德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孙其明教授(同济大学社科系),他们独到的见解使我对本书的补充修改有了明确方向。对我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的还有:陈之骅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曹长盛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李兴耕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胡瑾教授(山东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等。另外,在写作过程中,我还参考了国内现有的各种书籍、文章,作者的名字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正是在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才使我的研究变得更容易一些。我还不能忘记济南出版社的朱孔宝同志,他为本书的出版和质量提高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当然,上述这些并不表示本书的缺点和错误不由我负责。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将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三年,他们二老先后染上绝症住进医院,这一噩耗给我带来沉重打击,使我不得不频繁奔走于沪鲁之间,倍感心力交瘁,一度产生了放弃读学位的念头。正是他们在病榻上给了我继续学习的力量和勇气。每次我回到家里,他们总是催我快点回去,安心把学业读完。与我相比,我的兄弟姊妹和爱妻尽了更多的孝心。在这本书问世的时候,二老已辞世三年,在痛悼之余,我将这本书献给他们,以寄托自己对二老无限的眷恋与追思。

田保国

1999年8月31日

|                |   |
|----------------|---|
| 序 言(周尚文) ..... | 1 |
| 序 言(叶书宗) ..... | 1 |
| 前 言 .....      | 1 |

## 上编 历史的考察

|                                      |    |
|--------------------------------------|----|
| 第一章 从十月革命到中苏建交(1917—1924) .....      | 3  |
| 一、苏俄政府宣布新的对华关系原则及<br>中国南北政府的反应 ..... | 3  |
| 二、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和中俄外交代表的初步接触 .....        | 5  |
| 三、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和张斯麟使团访俄 .....            | 8  |
| 四、裴克斯、赵飞相继来华和《孙文赵飞宣言》的发表 .....       | 10 |
| 五、加拉罕在北京的谈判和中俄协定的草签 .....            | 12 |
| 六、中途变故和《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订 .....         | 15 |
| 七、简短的结论 .....                        | 17 |
| 第二章 中苏关系的发展与逆转(1924—1931) .....      | 19 |
| 一、建交后的中苏交涉和无果而终的中苏会议 .....           | 19 |
| 二、《奉俄协定》和《苏日协定》引起的外交摩擦 .....         | 22 |
| 三、中东路危机和张作霖反苏政策的升温 .....             | 25 |

|                                          |     |
|------------------------------------------|-----|
| 四、北京政府搜查苏联使馆和苏联撤使 .....                  | 27  |
| 五、孙中山的联俄和蒋介石的反苏 .....                    | 31  |
| 六、简短的结论 .....                            | 35  |
| <b>第三章 中苏复交和谈判(1931—1937)</b> .....      | 37  |
|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远东局势和苏联政府的立场 .....            | 37  |
| 二、苏联对中国抗日的支持和中苏复交 .....                  | 41  |
| 三、中苏关系的新创痕——中东铁路的非法售让 .....              | 44  |
| 四、国民党“联苏御日”决策的酝酿 .....                   | 48  |
| 五、谋求实质性合作的中苏秘密谈判 .....                   | 51  |
| 六、简短的结论 .....                            | 56  |
| <b>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和苏联(1937—1945)</b> ..... | 58  |
| 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和《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           | 58  |
| 二、敦促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交涉 .....                    | 63  |
| 三、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援助 .....                  | 66  |
| 四、《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 .....                      | 71  |
| 五、抗战后期国民党的反苏反共和苏联<br>对中国问题的干预 .....      | 75  |
| 六、简短的结论 .....                            | 79  |
| <b>第五章 抗战胜利后的中苏关系(1945—1949)</b> .....   | 81  |
| 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                    | 81  |
| 二、苏联与国共接收东北权力的斗争 .....                   | 87  |
| 三、国共重庆谈判和内战爆发前苏联的对华政策 .....              | 93  |
| 四、内战爆发后的中苏关系和中国革命的胜利 .....               | 97  |
| 五、简短的结论 .....                            | 101 |